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张爱玲的美国世相摹写
——“广阔性”景观、族裔文化、性革命

陆　洋

摘要：在张爱玲的后期作品里，“美国”是现象与概念、具象与抽象的混合体。美国书写的对象有搅动观者万千思绪的异地景观，也有族裔混合社群里的刻板印象和角色扮演，还有在变革浪潮冲击下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裂变与自我调整。张爱玲后期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的探索辐射了全球性的地理空间和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跨度，以及由前后期创作中的对应主题串联起来的个人知识与经验总量。张爱玲的美国世相摹写融合了异国生活的再社会化体验，凸显了观察视角、情感态度和身份自我表达随着移民主体与或熟悉或陌生的情景遭遇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后期创作中现实问题意识的深化和相对立场的切换。

关键词：张爱玲；广阔性；族裔文化；性革命

Abstract: “America” serves as a mixture of phenomena and concepts in later works of Eileen Chang. Chang wrote about American social geography including the landscapes that stirred a myriad of thoughts in the observer, stereotypes and role play in the multiethnic society, and the fragmentation and self-adjustment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movements of the 1960s. The explor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reality in Chang’s later works encompasses the global geographical scope and the historical span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It also embodies the coherent themes that relate to her early works, constituting the sum of her 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merican social geography sketched in Chang’s literary works is integrated with the re-socialization of her foreign life, highlights the uncertainty of perspective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identity expression arising from the immigrant subject’s encounters with both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circumstances, and thus reflects the deepening awareness of real-world issues and the dynamic shifts in her relative positions.

Key words: Eileen Chang; immensity; ethnic culture; sexual revolution

作者简介：陆洋，文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电子邮箱：yangyangnj@126.com。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张爱玲的反类型化改写研究”（编号：24YJC751027）的阶段性成果。

张爱玲的后半生是一段辗转于美国多地的离散之旅。1955 年她从檀香

山入境，先后在纽约、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华盛顿、俄亥俄州牛津、马萨诸塞州康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等地寓居，1973年起定居洛杉矶并终老于斯。从个人资料上看，了解张爱玲美国生活面貌的基本途径是她的通信内容，除却写作进度的汇报、沟通以及关于出版事项的洽谈和商榷，信件中高频出现的话题当属搬家、看病、驱虫等劳神费力的“小事故”。[①] 从作品的艺术特征上看，不同于前期小说和散文纪实性地展现了上海城市生活的细微脉动，后期以美国为事件发生背景的描述中很少见到人群栖息的市井场面。综合这两点，读者很容易形成如下印象：赴美后生活质量的降低和环境适应性的减弱造成了张爱玲观察视野的内向化和自我中心化。

张爱玲自身对于美国生活境况的消极表态、通信对象与拜访者为其持续建构的避世者形象，以及研究者试图用合理主义思维解释前后期风格变化的考证，都对张爱玲后期创作脱离现实印象的定型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张爱玲的旅美经历叙述笼罩上了一层想象的美学隔膜。首先，在信件这样被默认为私人领域的话语空间，张爱玲从身体状况和社交习惯两方面不断诉说美国生活的辛苦与疏离，嗟叹用于维持生计的时间、精力损耗给创作带来的干扰。[②] 其次，张爱玲自身强调的生存困境与创作颓势在通信对象的回应与来访者的记录中得到了承认与附和。无论是夏志清、庄信正从书信中的自述判断其“体弱不同人来往”（张爱玲，夏志清 157）、“离群索居”（张爱玲、庄信正 46），还是水晶寻张爱玲而不遇后确认其“鲜与世人往来”（10），都是正向接受了说话人自我表达的个人信息，并且本着会话的合作原则筛选出关联性强、主题连贯的信息加以统合，从而塑造出后期张爱玲符合动荡时代文学传统、体现离散文人共通心态的隐逸形象，使得其在美国的居住方式变成了一种文化移民模式的顺延。最后，有关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研究习惯以作者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为先验假设，寻找能够佐证该前提的怀旧文本现象，继而论证文本中回归母题的要素出现的必然性，最终返回并固化了张爱玲旅美后离群索居、文学活动与时代动向脱节的结论。[③]

---

① 参见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249。

② 例如1969年1月至1971年6月，先后任职于赖氏女子学院和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诉说了职场人际关系的不睦，由于无法融入工作环境“糟蹋很多时间”。而1984年10月至1988年4月间她只给夏志清寄过一封信，解释因躲避“虫患”忙于搬家，身心疲惫不堪，“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之后1993年1月、1994年5月的书信中，张爱玲重复使用“精神不济”“做一件事要歇半天”等显示出精神衰弱症状的表达，并将写作计划停滞的原因归结于此。参见张爱玲、夏志清 301，340，347。

③ 例如许子东着重分析张爱玲晚年咀嚼过去家庭、恋爱创伤记忆的缘由，林幸谦关注张爱玲后期执迷于病痛和虫患的书写等选题嗜好。参见许子东：“《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新文学史料》1(2011)：19-27；林幸谦：“病痛与蚤患书写与张爱玲已出版书信探微”，《南方文坛》1 (2018)：159-166。

对比张爱玲与不同对象的来往信件在篇幅、话题和语气上的差异，不难发现信件发挥着根据双方关系的性质、距离和交往需求制定话语策略的功能。信件在达到交际目的的同时，也充当着一种话语施效行为，[①] 即张爱玲通过对自身的疾患等约定话题的反复言及和着重强调，引导读信者形成关于自身避世形象的定向认识。这种话语行为的本质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苏伟贞指出信件之于张爱玲“是最微观的剧本”(261)，相当于在一对一的最小社交情境内进行定义角色的演出。由于这种情境角色定义基于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默认的信赖关系，[②] 通信对象似乎也都接受了张爱玲提供的印象生产素材，以配合的姿势维护她提供的现实定义。故而笔者产生如下疑问：如果表演性的言语行为多少涉及印象的操纵，仅依托书信、传记等事实资料是否就可以准确勾勒出张爱玲旅美后社会接触与认识重组的实际样态？当我们以张爱玲的文字为向导进入美国社会空间，是否需要留意更多不同来源的论据和交叉印证的环节？

疑问缘起于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通信内容的殊异之处。在致邝、宋二人的多封信件中，张爱玲用随笔式的文风记述了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观感与见闻，从居所周遭的自然景物引发的闲情偶寄，到插播洛杉矶地震及之后的社区暴动等重大社会事件，再到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选举形势的率性杂谈，显示出旅美后的张爱玲对于时事热点和社会动态保持着相当高的敏感度。鉴于美国的社会现实并未淡出过张爱玲的观察视野和话语场，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信件里“离群索居”的人格表象更接近于社交防备措施而非日常行为模式。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张爱玲对于美国事物的印象，我们有必要留意传记资料以外的话语形式，从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中的重复主题、典型表达与叙述情感等入手，另辟蹊径进行观察。本文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张爱玲如何审视美国的社会结构及人文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并说明其与自身文化教养、审美感性以及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信件与访谈中表露的现实关注点如何在张爱玲后期的小说、散文中得到彰显，由社会性的话语焦点延展为系列性的文学主题；三是该如何看待张爱玲信件里的个人表达和作品里的自传性叙述在评价美国生活时论调的分歧。这种口径的不一致既是由写作目的、文类规范以及与对象读者之间交流代码的差异引起，更标志着张爱玲观照美国这面棱镜时映射出的自我割裂。本文的最终目的，是考察旅美后的再社会化体验对于张爱玲后期创作观念及情感的复杂化呈现具有怎样的意义。

---

① 参见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8-109。

② 参见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12。

一、美国景物描写的“广阔性”

对于喜好观察熙攘街市的张爱玲而言，以广袤自然和现代化建筑为主的美国地貌似乎与她的空间审美格格不入，异样的空间感在文本层面上反映为后期作品里人与景物的失衡和剥离。前期作品里，张爱玲惯于捕捉富有人间烟火气的街市景观。在上海及香港的城市景观描写中，人的活动紧密嵌于其生息的功能性场所当中，以充盈的体量感占据画面的中心。而在以美国为对象的景物描写中，人和周边环境的相对位置和比例都发生了变化，微小的人物如同悬浮于绘有空旷风景的背景板上方，无法融入身处的场所中，而显示出错层的疏离感。但张爱玲笔下的美国风土又并非抽离人物自我意识的“无我之境”，未曾脱离主观化的情感渲染。

张爱玲曾于1962年3月至1966年9月居住在华盛顿。其间经历了作品在美国市场的冷遇、丈夫赖雅的瘫痪和离世、《怨女》原稿的遗失和出版波折等事故，华府的五年旅居生涯可以说是张爱玲后半生现实忧患意识较为迫切的岁月。自传性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后半部分就投影了这段华府生活的记忆。小说主人公赵珏与恩娟本是女校同窗挚友，毕业后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多年后在美国相遇时已身份悬殊。赵珏与丈夫分居后，只身前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的传译员。一次她被心怀不轨的上司邀约外出谈话，从汽车里看到华府中心区域的景象：

> 华府特有的发紫的嫩蓝天，傍晚也还是一样莹洁。远景也是华府特有的，后期古典式白色建筑上，浅翠绿的铜锈圆顶。车如流水，正是最挤的时辰。黑铁电灯杆上端低垂的弧线十分柔和，高枝上点着并蒂街灯。（张爱玲 2004：45）

这段风景描写来自坐在车中的叙述者看向远方的眺望视角。觉察到对方意图的赵珏不仅中断了语言交流，发出自我保护的肢体动作信号，思维活动也处于“一念不生”（46）的停滞状态。根据巴什拉的理论，静止不动的状态使观望者可以身处一地，知觉却游离至他处，突破生活现状的抑制和谨慎态度的阻碍，获得想象和存在的广阔性。[①] 赵珏的视线越过了车内充斥着权力压迫和性索取暗示的“狭小的空间”（同上），投向远方华府市区充满秩序和清洁感的夜景。上文所引的景物描写里，天空和高大建筑的有序排列突出了广阔性，这种广阔性既是视觉印象上的，又是象征意义上的，是从华盛顿“以国家的伟大作为它设计和建造的灵感来源”（段义孚 294）的

① 参见巴什拉 199-201。

城市空间概念中生发出来的。更进一步来说，华盛顿城市景观的宏伟和壮丽蕴含了双面性的价值寓意，即一方面凭借巨大的空间体量演出了向往“崇高”的西方美学理念和颂扬国家力量的宏大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又使人联想到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独裁帝王的辉煌”（段义孚 295）。小说中交代了车辆所在区域接近国会山庄，作为一处纪念碑式的地标，国会山庄将国民信仰和政治权威具象化为可见的实体。而提到政治权威，小说先前已介绍恩娟的丈夫是美国议会中的红人，赵珏与恩娟虽同处华府，但彼此间横亘着显见的阶级鸿沟，这使得赵珏能够用外部视角评判恩娟代表的美国上流社会的理想生活方式。相较于巴什拉对广阔性的浪漫化解读，《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华府风景描写贯穿着“观看的傲气”（巴什拉 207），传达了叙述者与眼前现实保持批评性距离的意愿。

小说中，孤独、广阔性以及静观形成了连锁性的文本效应。在巴什拉看来，广阔性与静观的视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广阔性是安静梦想的动力特征之一”（201）。美国式的广阔风景和梦境主题更为直接的联结出现在《小团圆》的结尾。这部自传体小说经历了赴美后近 20 年的创作、修改时间，既能允许张爱玲充分开发前半生记忆的角角落落，又能加入美国生活的即时感想。小说结尾处，女主角盛九莉移民国外，梦中浮现与分手已久的恋人重聚的场景。梦境原型来自 1936 年上映的美国影片《寂寞的松林径》（*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九莉幼年看过此片，记忆最深的是片里的取景地点——弗吉尼亚州蓝脊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这是美国早期版图扩张中遇到的第一块高大山地，也是现代美国人寄托乡愁情怀的精神故土之一。《小团圆》里的美国风景描写只有两处，一处是九莉在华盛顿看到的街景，是用现实景象反射表层意识里自我身份定位的实写；另一处则是梦里的蓝脊山脉风光，是用诗意形象展现深层意识里记忆沉淀和隐秘愿望的虚写。九莉的梦境空间由“青山”“碧蓝的天”“满地树影”（张爱玲 2014：283）和松林构成了广阔的自然景象，松林里阖家团聚的一幕让她在梦醒后依然感到快乐。在两部小说中，广阔性景观都出现在静观或睡梦这样的静止状态里，在模拟自然的人造空间中释放了孤独的心绪，并被转化为支持人物现实生存的独立意志或情感蓄能。

美国景物广阔意象的另一层内涵是市容的空旷和邻里联系的松散。散文“重访边城”（1962）对比了台北和华盛顿的市容，称华盛顿“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萎缩，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缺乏台北街道的“温暖感”（2012：264）。这里的空间认同感显然更倾向台北。张爱玲描摹华盛顿的文字和前期的上海街市素描在旨趣上大相径庭。前期张爱玲尤其看重在日常事务的共同参与中结成的社群人际纽带，并将琐细、芜杂、平凡的都市生活感觉上升到历时性的中国特

色市井美学。通过城市间的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宏伟建筑还是荒野景观都不属于张爱玲的欣赏范畴。比起巴什拉借以扩张想象力的“广阔性”释义，张爱玲笔下的“广阔性”表达透露出更鲜明的否定含义。

在“道路以目”（1944）、“中国的日夜”（1947）等前期创作的散文中，张爱玲将自身塑造为惯常在熟悉街区行走并环顾四周景物的（本雅明意义上的）“游荡者”。张小虹更是将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城市经验定义为在人群的摩肩接踵中消解明确身体界限的“空间接触感染”（85）。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汽车的推广降低了人们在街头近距离相遇的机会，使得“游荡者”难以通过跻身人群将自身化作观察对象的一部分，因此也削弱了主客体之间的共同关注和情绪共鸣。张爱玲后期作品里，写景重心从人流转向车流的同时，叙述者行走中的移动位置也被静观的固定位置所取代。汽车的泛滥是张爱玲眼中美国大城市的共同特征。散文“一九八八至——”以洛杉矶为例，深度探索了美国城市的社区人文生态。文章开头介绍洛杉矶以汽车数量之多闻名于世，接着描述了乘客寥寥且效率低下的公共汽车站，指出私人汽车的普及引发了公共交通衰败的问题。叙述者采取静观的姿态，从山顶依循地势向下俯瞰，汽车过桥的景象缩小为在“伸展台”上展示“玩具汽车”（张爱玲 2012：286）的微型景观。缩影化的想象力在这里改变了观察者与周围世界的物理体积比例，从而有效抵抗了广阔环境的“溶解作用”（巴什拉 174）。将眼前的汽车比作想象中的玩具展台，张爱玲借助惯用的“以实写虚”（许子东 172）的意象结构否定了现实的庄重性，以调侃的口吻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被工业产品异化、商品化的生活方式。之后观察者将视线转向山下的街道，平移过“极宽阔的沥青路”、路边杂乱无章的楼房、冷清的人行道及商店，加强洛杉矶郊区“荒凉破败”的观感，进而总结洛杉矶“简直就是个空城，除了街上往来车辆川流不息”（张爱玲 2012：287）。“广阔性”在这里成为社群组织丧失活性、人气的代名词，而人类活动的萎缩与汽车规模的膨胀形成了空间势能的反差，提示出人居环境的衰退与工业化进程、消费主义盛行之间的关联。

“一九八八至——”中散发着末世气息的现代城市描写与美国大众对于城市化的普遍认识是存在共性的。段义孚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出发，指出美国主流环境观是非城市化或者说反城市化的。具有勤劳、淳朴美德的农民形象成为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当这种赞颂农民精神的理念渗透进美国文化，相伴而生的是城市价值的矮化。[①] 普通民众倾向于认为城市是自然生命力的对立面，也是新大陆民主价值观的对立面。梭罗、爱默生等新英格兰作家回归自然的理念就体现了这种超验主义生态伦理，而译介过他们

① 参见段义孚 161。

作品的张爱玲将二者重视自然的看法引申为对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担忧。张爱玲的美国城市批判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审视现代都市的弊病，反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过度工业化、商品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群人际纽带的解体，而非反对现代城市本身。张爱玲曾用“可爱”（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23，27-28）形容纽约印象，认为纽约都市文化成熟的地方在于它是内部自发演进促成的。

张爱玲截取的美国城市生活片段除了固定视角下的静态观察，也包含通感式的联想和沉浸式的体验。在 1976 年致宋、邝二人的信中，张爱玲记述了路过旧金山市花摊和在洛杉矶图书馆门口观赏和触摸热带兰花时的感动。[①] 点缀街景的自然景物为现代城市肌理注入了生命的鲜活质感，滋养着人们诗意的栖居情怀。《同学少年都不贱》里铺展开的广阔性景物最后聚拢在街灯一点的凝眸上。街灯借用了枝上花朵的意象，象征着城市布景效法自然的一面：人为造景不仅可以模仿生物的形态，而且能够汲取生命的灵韵，使之得到艺术化的再现。连枝花也是张爱玲前期作品里出现过的中国古典文化符号，散文“诗与胡说”（1944）举“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张爱玲 1944：33）这一意象，用来代表作者所推崇的中国式日常美学。然而，这种母题移植式的空间描写在后期的美国背景叙事中并不多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多样性的社会构成和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给了张爱玲更多摸索、探究新事物的契机，而不是没入熟悉文化场域的环境。

二、族裔杂居体验与东方主义批判

开放式移民政策主导下的族裔杂居现象是美国社会多样化构成的具体表现之一。族裔杂居状况相关的叙述既是张爱玲后期美国书写的重头戏之一，也是指引其加深文化多元性认识的窗口。

张爱玲眼中美国文化的丰富形态是由各族群体标志性的风俗习惯汇聚而成的，从服装、语言、饮食上可见一斑。民族性外显的着装交织出族裔杂居形态最简明直观的视觉印象，也承接了张爱玲长期以来关注服饰的文化审美侧重点。在乘船赴美的旅途中，张爱玲途经夏威夷火奴鲁鲁，见到当地的游行队伍中各族裔团体都穿着具有辨识度的改良民族服装，甚至有混穿其他族裔服饰的情况。她虽然认为改良方式有不妥之处，却也被现场的祭典氛围所吸引，称之为“萧伯纳威尔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预演”（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21）。高翔指出，火奴鲁鲁的“人种”考察与张爱玲的美国第一印象形成暗合，[②] 这幅最初的美国风情画中洋溢着不同种族消

① 参见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287，289。

② 参见高翔：“《谈看书》：张爱玲对美国‘非虚构’潮流的一次回应”，《扬子江文学评论》4 (2023)：72。

解边界混入彼此的游戏感觉。在语言方面，张爱玲颇感兴趣的是移民英语使用中的母语迁移现象。散文“把我包括在外”（1979）介绍了东欧移民高尔温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介语用法。张爱玲没有将高尔温的语法错误视为语言交流的障碍，反而积极评价了其对语言的创造性转化和风趣的表达效果。她分析高尔温无法按照严格的语法规范习得英语的原因是“个性强”，结尾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引用了高尔温的名言“把我包括在外”（张爱玲 2012：123），示意自己同样处于美国舆论主体的边缘位置，既提示了高尔温二语习得中的心理屏障或许与他融入美国社会的保留态度相关，又借高尔温之事自白心迹。另一篇有关美国少数裔英语使用状况的散文“笑纹”（1993）则触及语言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民族情感。张爱玲先指出在美国，关于少数裔口音的玩笑只有自嘲的形式才能够被接受，否则有“种族歧视”（172）之虞，又从传承脉络和当代国情的角度分析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介意口音玩笑的原因，这种从历史和地理的纵横向度透视现象的视角是张爱玲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手法探讨族群文化的常见切入点。在饮食方面，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1980）记述了在各族裔居住区的专门商店购买食物的见闻，张爱玲不止于描写食物的外形及味道，更介绍了食物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饮食习惯体现出的族裔文化风俗。这种关注异文化间的渗透和接纳多于单一文化表征的观察思路，和美国族群文化鼓励融合而非对抗的基本性格产生了内在共鸣。

虽然张爱玲的世界主义人文视野与美国文化融合性的一面相洽，[①] 但她后期文字中的戏剧张力和情感层次却更多来自冲突性的方面。从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天起，张爱玲就遭遇了族裔杂居难以避免的族群间理解代沟。她在《对照记》中回忆接受入关检查的情形，记录入境数据的日裔工作人员错将她的身高值填大，使她“憎笑”（246）。张爱玲定居美国后，在与其他族裔的现实接触中亦时有摩擦。1989年3月，她过街时被人撞倒，右肩骨裂，在给姑姑张茂渊和夏志清的信中写肇事者是“中南美洲青年”（张爱玲、夏志清 313），可见对方的人种特征是事发当时的记忆点之一。1992年4月，洛杉矶发生少数族裔暴动，张爱玲在致友人的信里对事件亦有所提及。回忆录和信件的内容似乎更多反映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冲撞与误会，相比之下，她在散文中模糊了对象读者意识和个人利害关系的漫谈则更贴近生活的规律状态。从“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我们得知，张爱玲对日本料理店的豆腐赞赏有加，也为罗马尼亚超市和意大利裔街区里异国情调的食品驻足。涉及种族相关的话题，张爱玲后期作品基本持淡化政治色彩的多元立场，但有

① 参见黄心村、黄子平、王风、吴晓东：“张爱玲与世界主义的人文视野”，《文艺争鸣》10 (2022)：125-136。

时也会表现出少数裔文化身份持有者的批判能动性。

在张爱玲后期作品中，种族方面的问题意识落脚在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趣味上，投射在性别偏见、阶级矛盾、国际政治局势、意识形态壁垒、全球商业化浪潮交织而成的多维现实场域中。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张爱玲受美国驻香港新闻处(USIS)的资助完成一系列符合冷战政治宣传要求的“命题作文”后，回归个人风格的小说《怨女》在美国出版界碰壁，让她切实感受到唯有附庸文化刻板印象才能打开英语圈销路。面对顺应本地市场需求还是坚持个人文学理念的选择，这一次张爱玲采取了与西方主流阅读偏好相背离的姿态。而正如她评价韩素音笔下的东西方恋爱桥段助长了西方人的身份认同，[①] 张爱玲深知种族与性别的文学话语规范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同学少年都不贱》中，恩娟与犹太难民从相恋到结婚，再到移居美国相夫教子，性别要素始终处于这段跨族裔结合叙事的醒目位置。姜云飞从恩娟、赵珏服饰的变化来探讨两人的种族身份意识及文化认同，认为恩娟的服饰符号“暴露出内心的弱势性别和弱势种族的内化和卑怯”（姜云飞 99）。该批评切中小说中种族、性别问题的症结，却忽略了文本所暗示的问题成因，即相比游离于家庭、婚姻、职场等稳定社会关系网之外的赵珏，恩娟的私人及公共活动场域中性别与种族的对立性质更加常态化。小说开头交代恩娟学“中东艳舞”惹赵珏发笑，可以看出她的跨文化扮演既达到了取悦他人的效果，又在无意识中完成了解构原型的戏仿。恩娟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属于双方知识教养契合的现代型婚姻，但正如叙述者的自由间接引语所评论的，恩娟婚后的装扮“接近于古典式的东方女人”（张爱玲 2004：28），证明东方主义想象也发生在家庭亲密关系的领域内。跻身美国上流社会后，恩娟的名牌服饰和日光浴晒黑的肤色抹去了自然身体上标记的原生种族印迹。身体不再记录遗传学方面的种族信息，而被用来展示流动的阶级身份。小说最后，《时代》周刊的照片里，恩娟在总统游艇上梳了丫鬟的发型，其取悦他人性质的表演从私人地带移入公共视野。这次演出不仅是社交行为，更是恩娟在公共传媒平台上含有政治色彩的亮相，潜在观众是美国社会的中上层人士甚至英语世界更广泛的读者群。这场依存型的换装演出既是取决于主体目标的自我选择，也是恩娟身处的种族、性别、阶级境况在复杂力学场中共同作用的结果。

扮演异域情调在张爱玲后期作品里是异文化交涉叙事中高度象征化的行为，往往与种族问题的性别化表征及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等后殖民现象难解难分，我们很难单独判断对于它的情感赋值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出于不同的目的，赵珏也进行过一次跨文化扮演。在华府招待外宾的晚宴上，赵珏

① 参见张爱玲、夏志清 23。

亲手制作了一套礼服，兼具古希腊风格装饰、马来服装线条、美国大众时尚配饰、中国古典调色等多种文化元素。赵珏着装的文化杂糅指向与张显特定国家形象的外交场合之间出现了错位。除此之外，赵珏的混搭还夹杂了个性化的手工剪裁与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商品，将“恋衣”这一拜物教性质的消费行为与女性发扬审美主体性的创造行为合为一体。张爱玲旅美后个人的着装旨趣亦复如此。根据信件内容可知，她赴美初期的着装依然以旗袍为主，在镶边、领高、用料等细节方面执着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①] 张爱玲挽发髻的造型被美国人说像“日本版画”，张冠李戴的评价反而让她“乐不可支”（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68），可见她是以谐谑的态度看待文化符号的混用和误解所导致的民族身份的混淆。通过模糊民族服饰象征的单一民族身份，赵珏制作了一件字面意义上的“百衲衣”，而“百衲衣”本身就是一个经常用于文化杂糅语境的隐喻。对比恩娟模仿古典中国女性的演出，我们能够发现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表演的目的性或者道德性，而在于利用文化元素的扮演是否体现了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忠诚。无论是从仓促的准备过程还是随机性的搭配手法来看，赵珏的扮演特质是对多种异质文化素材的功能性拼凑和碎片化利用。恩娟定向的类型扮演廓清了界限，赵珏则模糊了界限。“族裔杂居”在恩娟这里是一种给定的、稳固存在的家庭及社会处境，在赵珏这里则是以打破文化纯血统信仰来对抗他者想象的行动原理。

族裔和性别虽然是张爱玲后期文学坐标系里能见度较高的两个差异维度，但仅考虑这两项，我们会发现影响事件走向和人物境遇的逻辑缺乏一致性。以中国男性的跨种族交际为例，《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萱望因为身材瘦小，贴合美国人预设的“纤巧神秘的东方人”（张爱玲 2004：41）这一种族形象定式，博得了美国女学生们的欢心。《相见欢》（1978）中瘦削的伍先生同样具备类型化的中国人外貌特征，却无法令西方女性感受到性魅力。要解释待遇差产生的原因，就需要在族裔与性别之外寻找其他变量。小说的人物描写其实已埋下了提示线索。两部小说都使用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形象的普遍文化符号来代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伍先生的外表被描述为“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2013：272），联系其于20世纪30至40年代前后留洋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人由于国力衰弱被西方世界视为低等种族，“东亚病夫”更成为中国男性遭到精神去势的代名词。萱望则被美国学生用“东方红”来指代，由此寄托对新中国这一动摇西方旧世界的政治力量崛起的憧憬。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在族裔及性别之外，加入了历史政治语境的变化和国际权力格局的更迭。张爱玲后期作品参照美国社会的样板构建了族裔、性别、资本与当代政治的乱序组合，不同种族间的冲突、回避与误读提供了文

① 参见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44、56。

本张力与意义再生产力的来源。

三、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思考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越战爆发后反战呼声的高涨以及国内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意识形态冲突的激化，由年轻人、少数族裔及性少数群体开展的人权运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遍布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身体的差异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普遍也是最本质的权力划分标准，“性”成为解放力量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先头阵地。性行为、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方面的抗争不仅使得资本主义父权规范和强制性异性恋体制发生了松动，而且以时代话语的形式在大众舆论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接收到以上信息，张爱玲在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相见欢》及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阐发了关于美国性革命的印象及感想。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兴起的性革命包括性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及同性恋权力运动三个部分。性解放运动属于嬉皮士领导的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一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旧金山的海特—阿希伯利区(Haight-Ashbury)是嬉皮士建立自由公社及举办大型活动的聚集地，张爱玲1969至1972年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期间曾在旧金山居住，或许对于当地嬉皮士活动有所接触或听闻。嬉皮士开展的性解放运动宣扬解放本能、自由选择性行为的方式及对象。性革命中的女权运动是国际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重要分支，其核心诉求可以概括为：消除就业、教育机会及社会待遇方面的两性差别，追求法律和人权方面的平等，谴责性别歧视、性暴力及坚持女性行使堕胎的正当权利。张爱玲主要是从电视新闻与杂志等大众舆论传媒上了解到这场运动(她称之为“新女权运动”)。19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同性恋者和其他受压迫团体一起开展斗争运动，抗议对于同性恋的道德断罪和病理化。但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反扑压制了同性恋运动的推进趋势。张爱玲完成《同学少年都不贱》的1978年，正是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反同性恋维权事件和哈维·米尔克(Harvey B. Milk)遭刺杀事件引发同性恋群体抗议示威的同一时期，由此可以推断同性恋主题在这部小说中的前景化与创作时期的社会舆论热点不无关系。[①] 美国性革命的发生既提供了作品的时代语境，又触动了张爱玲与社会现状息息相关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

---

① 以上历史背景相关介绍参见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79页；江振春：《爱与自由：美国同性婚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32-157页；Lillian Faderm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188-245。

在张爱玲看来，性解放运动是年轻人非理性、不健康的生活方式。1971年与殷允芃谈及美国嬉皮士运动时，张爱玲首先表示不喜欢嬉皮士的结党行为，虽然认可嬉皮士精神反对现行体制的一面，但结论是“他们的表现方式，details，我不赞成”（殷允芃 11）。这段在赞成和反对之间来回摇摆的感想和后文将要提到的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评论方式颇为相似。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性解放运动造成的“性泛滥”被认为是与垃圾食品相提并论的“官能上的享受的竞争”（张爱玲 1992：442）。《同学少年都不贱》记述了一场性行为对象不固定的嬉皮士集会。某天傍晚，迷路的赵珏与一群美国大学生相遇。对方沉默的态度和尴尬戒备的神情预示着行动的隐秘性，跟随他们行走的赵珏一路发现难以解释之处的观察描写与满腹狐疑的心理描写为事件增添了诡异危险的气息。最后到达一片树林，“黑暗中依稀只见一棵棵很高的灰白色树干”，“有点寒烟漠漠起来”（2004：40），阴暗荒凉的场景氛围加重了人物与读者面对未知状况的恐惧。第二天，赵珏从与熟人的交谈中揣测出集会的真相，两人迂回、吞吐的谈话方式暗示了话题的不得体。由此可窥见张爱玲后期作品中性解放运动的叙事基调趋于负面。

张爱玲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多次在散文中以专题形式探索过性别问题。前期多着眼于概念性的泛论，后期扩展到对措施可行性的探讨，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认识具有跟随着女性运动与时俱进的趋势。1978年发表的“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从英语人称代词的性别标记入手引入美国女权运动的话题，张爱玲认为现有的人称代词本身即包括了男女两性，不赞成将女性称谓特殊化。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倡性别分离主义（separatist feminism），也就是将社会与文化中两性的情况区分开来单独对待，张爱玲对这一主张持反对意见，揶揄激进女权主义者要求一切职业对男女均等开放的提议，但随即话锋一转，肯定了美国女权运动“同工同酬”的纲领口号，因为其“切合实际”（2012：110），可见她反对激进主张的原因是其流于观念化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张爱玲还以战争这样的男性垄断领域为例，提出两性权利义务应当平等，但又指出女性参军的不利条件。她关于女性运动可行性的讨论随时在观念与现实之间游移，并以现实为最终的衡量标准。散文最后阐明了女权运动的必要性，即亟须矫正美国女性缺乏独立人格及经济来源的历史传统。张爱玲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对试错过程表示了理解与包容，认为女权运动如时尚，“必须走极端，不免有荒谬可笑的成分，并不影响妇运主旨”（111）。将时尚比喻为政治运动，修辞本身透射出颠覆两性社会行为传统赋值的女性主义政治美学，而这一结论也说明先前的“唱反调”更类似于一种自我检视性质的内部批评。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同性情感在现有研究中经常被解释为男性缺席环

境(闺阁、女校)中发生的“情境式(境遇性)同性恋”[①]，本文在延续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关注张爱玲在后期作品中明确使用“同性恋”命名体制外女性同性亲密情感的动因以及命名行为体现的变革意义。张爱玲体察女性同性亲密情感的创作可以追溯到1932年刊登于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的小说“不幸的她”，围绕女性密友多年后再聚首的主题与《相见欢》及《同学少年都不贱》形成了自涉互文。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虽然涉及女性间的交互情感需求，以及以男性为代理人传递的同性欲望等话题，但是“同性恋爱”一词的出现要等到1974年“谈看书后记”的发表，之后类似修辞在《同学少年都不贱》《相见欢》以及回复《相见欢》读者意见的“表姨细姨及其他”(1979)中都有提及。由此可以推断，女性同性情感的正式命名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同性恋现象的显性化、去污名化不无关联。

回想中的过去与叙述的现在所处的不同历史、地域环境下的同性恋话语风气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有着历时性的体现。中华民国建立后，女子学校教育渐次普及，为女性辟出分离空间的女校成为大多数城市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首选。正值青春期的女学生由于和异性隔绝，常见的做法是将同性学友或师长视为情欲对象。对于女学生的同性恋爱倾向，当时面向大众发声的知识界或采用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判定其为病理性症状，或抨击其为有损个人健康并且危害社会秩序的性倒错。[②] 但女校的同性恋爱之风并没有因为保守社会舆论的反对而停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及中国本土电影里男装女明星形象的风靡、杂志上男装丽人照片的多见，以及越剧女扮男装演出的兴盛等，为女学生的同性恋爱添加了性别角色扮演的趣味性。[③] 女学生在人为建构出来的暂时空间里体验现实中几乎不可能的浪漫情愫，但同性恋爱却很少延伸到批判口吻之外的公共话语范畴。而1960年代席卷美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启发张爱玲在回顾女校的同性恋爱现象时拥有

① 已有论者分析了张爱玲后期作品中的“境遇式(情境性)同性恋”的精神内涵及表现方式，参见王百伶：“百合花开——论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女同性恋文本叙事”，《嘉兴学院学报》5(2014)68-69；张小虹 28-44。

② 例如冰心在1936年慕贞女子中学演讲“我自己的中学生活”中评价同性恋爱是“不健全的，自私的爱”。潘光旦在评论陶梦谨、刘思莹案的文章里称同性恋为“变态的感情生活”“变态心理”，认为应该将同性恋者送入专门的心理治疗机构隔离。上海世界书局编译主任詹文浒、文人周越然也将同性恋视为“变态”或病理性的。参见倩茵：“谢冰心女士讲我自己的中学生活”，《慕贞半月刊》4/5(1936)：29；潘光旦：“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陶刘妒杀案的社会责任”，《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441-442页；詹文浒：《两性问题：青年性教育指导》。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第44、46页；周越然：《性知性识》。上海：天马书局，1936年，第164页。

③ 参见菅原庆乃：“女扮男装的现代摩登女性——电影〈化身姑娘〉系列与女性观众”，《中国的娱乐与性别——女性之“变”》，中国性别研究会编。台北：台大出版社，2024年电子版，第21-37页。

了同时代和跳出时代框架的两种视角。赵珏遥想恩娟与芷琪在女校中的亲昵交往，“就算是同性恋，时至今日，尤其在美国，还有什么好骇异的”（张爱玲 2004：49）。因此，“同性恋”一词的起用需要概念所对应的实体以被公众接受的形式出现。

“同性恋”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并非泛指一种女性亲密关系，而是包含以下特征：一方对另一方抱有高浓度、狂热的感情，近乎迷恋或崇拜；掺杂着排他性的占有欲；由此生出竞争意识，指向与对方建立亲密关系的其他异性或同性。在《相见欢》中，叙述者解释伍太太之所以对荀太太的丈夫心怀不满，是因为“少女时代同性恋的单恋对象下嫁了他，数十年后余愤未平”（1992：428）。《同学少年都不贱》的结尾处，恩娟感叹芷琪遇人不淑，少有地流露出激烈的情绪反应，因此赵珏猜测恩娟单方面抱有同性恋爱情感。张爱玲的同性恋界定与20世纪70年代占据主流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1977年美国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发表了“不断扩展女性之间爱的意义”（The Meaning of Our Love for Women Is What We Have Constantly to Expand）一文，提倡“与女性一体化的女性”（woman identification）（Rich 225）[①]。里奇及其他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认为，女同性恋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利益与情感的连续体，女性之间应该发展出创造性、革新性的交往方式，建立跨越阶级、年龄、种族的互助机制，改变过去为男性和家庭消耗全部生命能量的生活方式。她还反对女性参与以“主动—被动”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分类的角色扮演（butch-femme）。张爱玲后期的女性同性恋爱刻画与上述认识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同性恋爱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不同之处一是作品中的同性恋关系并不排斥类似异性恋关系中的性别气质区分，例如赵珏暗恋的女校前辈赫素容身材高大，外形“有点男子气”（张爱玲 2004：19），而她在学校里的亲密女伴则“纤瘦安静沉默”（20）。在赵珏与赫素容的关系中，赫素容看似代表了“男性化”的一方，但无论是情感的表达主体还是行动的实施主体都是赵珏，所以张爱玲表面上在同性关系书写中复制了异性恋类型化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却颠覆了性别气质对应的主动—被动角色分配。另一不同之处是后期小说中，产生同性恋感情的人物，无论是伍太太、恩娟还是赵珏，她们从来没有远离过与男性日常共处、伴有利益和感情牵绊的异性恋社会。《相见欢》总结了社会对待这种女性同性恋爱的普遍认识，即这种情感的生发是阶段性的，因此不会威胁社会整体的异性恋婚姻制度。在张爱玲看来，阶段性的同性恋爱是一种见于文学的跨文化普遍现象。在1973年10月31日写给宋淇的信里，她分

① 文中未说明译者的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析《红楼梦》里宝玉对秦钟的感情性质“有点像有些英国学童going through a phase(度过一个阶段)”（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 228)。这里提到的必经阶段也被民俗学家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称为“过渡仪式”，指的是社会成员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过渡的中间阶段。[①] 赋予同性恋爱阶段性的特质，或许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同性恋叙事往往以“情境式”模式出现的原因。但正如张小虹指出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同性恋爱或许是特定情境中产生的，但它作用的场合却超出了特定情境，成为女性人生中一种持续性的情感体验。[②] 在看似以男性伴侣及宗族事务为中心运转的生涯轨道中，女性人物仍然保有一份投注于同性对象的强烈关怀。

《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孕育女性同性恋爱的“情境式”场所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男性隔绝，二是带有宗教的神圣性。赵珏等待赫素容的场景里，路边的白花被赵珏比作佛教的圣物，对应着陷入热恋的赵珏将恋爱对象理想化甚至神化的盲目心理，也象征着女性同性恋爱的反世俗性。小说借赵珏之口，将女性间的同性恋爱纳入超越性别的、乌托邦式的纯粹爱情观中。赵珏确信，“那些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为自己着想，或是为了家庭社会传宗接代，那不是爱情”（张爱玲 2004：20)，她定义的爱情是与个人利益导向、传宗接代思想和社会优生学宗旨不相干的。排除男性参与的“爱情”观与之前所提到的性别分离主义主张有相似之处，背离了宗法制父权体系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婚姻规范，它在张爱玲后期小说中的实践形态之一，就是不随当事人年龄、婚姻、生育状况改变的女性同性“爱情”。在赵珏的语汇里，“爱情”和“恋爱”的概念是区别使用的，“恋爱”等同于“恋爱结婚”，是一种在强制性异性恋框架内实施的行为。在赵珏之后的人生履历里，和异性“恋爱”的体验代替了单恋同性的“爱情”冲动，但正如滨田麻矢指出的，异性恋给赵珏带来的更多是伤害和孤独这样的负面影响。[③] 与之相对的是，恩娟从来没有“恋爱”过。小说里赵珏对于猜测恩娟是否有过同性恋爱情感抱有异常的执着，或许照应了小说写作和故事内叙述发生的时空——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性革命触发了人们了解和揭示自我及他人性向的愿望。张爱玲的后期作品中，“与女性一体化”的女性人物看似无缝融入了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却怀有分享边缘身份、谋求情感连带的同盟意识，而这种由彼此不公正待遇激发的共情反应有时也演化成为抗议男权社会的导火索。

---

① 参见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年，第2页。

② 参见张小虹 30-31。

③ 参见浜田麻矢：“女学生だったわたし—張愛玲『同学少年都不賤』における回想の叙事—”，《日本中国学会報》64 (2012): 296。

结　语

取材于美国生活经历的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张爱玲后期体验、观察、感受到的现实肌理，也反映了她对美国社会结构及时代热点问题的纵横透析。其后期的小说和散文运用一系列表象及叙事策略，凸显了事件描述及释义的不确定性。美国风景描写着力营造具有“广阔性”特征的意象，静止不动的异国观察者取代了前期行走在上海街头的土著“游荡者”，视角的水平切换模拟了现代都市的断层分布格局，通感式的联想与沉浸式的体验则捕捉到了都市中自然生息的瞬间灵韵。关于种族杂居及族裔文化融合的意义和影响，散文持淡化政治色彩的开放论调，自传体小说则借助文化碎片拼凑这一扮演行为，对抗将东西方二分的他者想象。性革命的三个方面在后期作品里都有场景化或主题化的呈现。小说照应了张爱玲对性解放运动抱持的负面印象；散文看似抓住女权主义运动的偏激部分加以否定，实际旨在先抑后扬，发挥内部批判功能。张爱玲以“同性恋”为名直白书写女性同性恋爱情感是其后期作品里具有争议性与革命性的实验，折射了背离父权宗法制家庭体系和强制性异性恋婚姻制度的爱情观。

总体来看，从文学创作与社会体验、见闻的关联程度上看，张爱玲的后期生活不能以“避世”一言以蔽之，而是处在“把我包括在外”的立场，即在地缘社群组织或单一文化共同体的外部观察纷繁多变的美国世相。她把都市化与人性疏离、种族杂居与异文化交涉、性别差异与同性恋爱等前期作品的关注点贯彻下来的同时，不断跟随现状的转变，调试、拉伸认知疆域与理解边界，从而深化并差异化了对个人与社会、历史与地理、主体与制度之间联动关系的考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kong jian de shi xue). Trans. Zhang Yi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来凤仪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Chang, Eilee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Eileen Chang's Essays* (zhang ai ling san wen quan bian). Ed. Lai Fengyi.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2.]

——：《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 *Every Junior Has a Good Time* (tong xue shao nian dou bu jian).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张爱玲文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 *The Literary Collection of Eileen Chang* (zhang ai ling wen cui). Beijing: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

[---. *Little Reunio*n. Beijing: October Arts &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诗与胡说”，《杂志》13, 5 (1944): 33。
[---. “Poem and Nonsense” (shi yu hu shuo). *Magazine* 13, 5 (1944): 33.]
——：《重访边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s &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怨女》。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 *The Rouge of the North*.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s &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张爱玲、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编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Chang, Eillen and C. T. Hsia. *Eileen Chang's Correspondence with Me* (zhang ai ling gei wo de xin jian). Ed. and annot. C. T. Hsia. Wuhan: Changjiang Literary and Art Press, 2017.]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Ⅰ》。香港：皇冠出版社，2020年。
[Chang, Eileen, Stephen C. Soong and Mae Fong Soong. *To My Beloved Friends: Letters of Eileen Chang, Stephen Soong and Mae Fong Soong* (zhi duan qing chang: zhang ai ling wang lai shu xin ji). Part I. Hongkong: Crown Publishers, 2020.]
张爱玲、庄信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
[Chang, Eileen and Zhuang Xinzhe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ileen Chang and Zhuang Xinzheng* (zhang ai ling Zhuang xin zheng tong xin ji).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9.]
姜云飞：“服饰与性别、种族身份认同——以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为例”，《名作欣赏》25 (2016): 99。
[Jiang, Yunfei. “Fashion, Gender and Racial Identification: A Case Study of Eileen Chang’s *Every Junior Has a Good Time*” (fu shi yu xing bie zhong zu shen fen ren tong: yi zhang ai ling de tong xue shao nian dou bu jian wei li). *Masterpieces Review* 25 (2016): 99.]
Rich, Adrienne.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s 1966-197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水晶：《替张爱玲补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Shui, Jing. *Touching Up Eileen Chang's Makeup* (ti zhang ai ling bu zhuang).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4.]
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Su, Weizhen. *Eileen Chang in Long Lens: Images, Letters, and Publishing* (chang jing tou xia de zhang ai ling: ying xiang shu xin chu ba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2.]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lian di qing jie). Trans. Zhi Cheng and Liu S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2001): 169-175。
[Xu, Zidong. “A Tentative Study on Zhang Ailing’s Techniques of Imagery” (wu hua cang liang: zhang ai ling yi xiang ji qiao chu tan).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01): 169-175.]
殷允芃：《那些年，这些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
[Yin, Yunpeng. *Those Years, These People* (na xie nian zhe xie ren).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张小虹：《城市是件花衣裳》。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
[Zhang, Xiaohong. *The Urban Life Is a Floral Garment* (cheng shi shi jian hua yi sh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